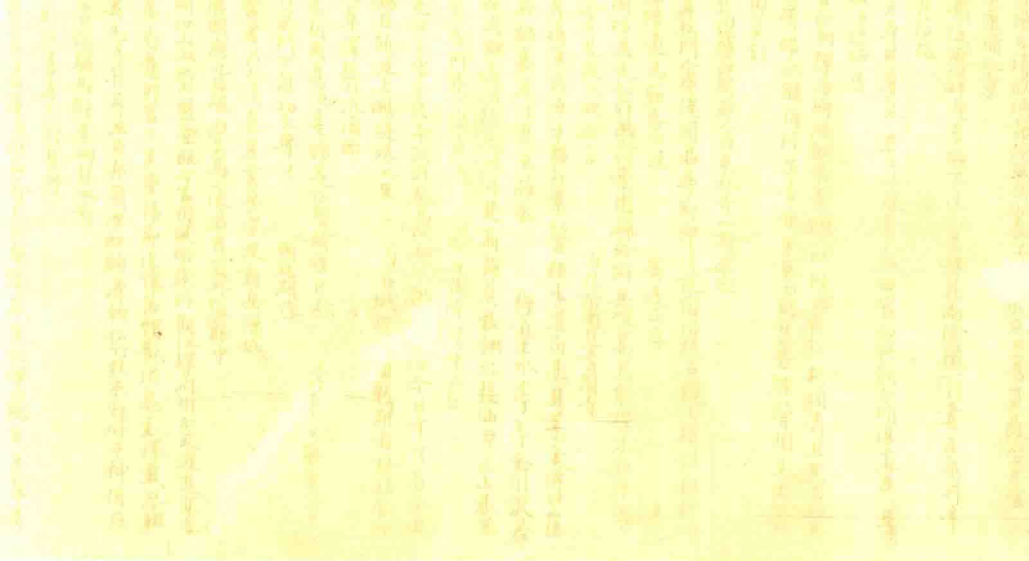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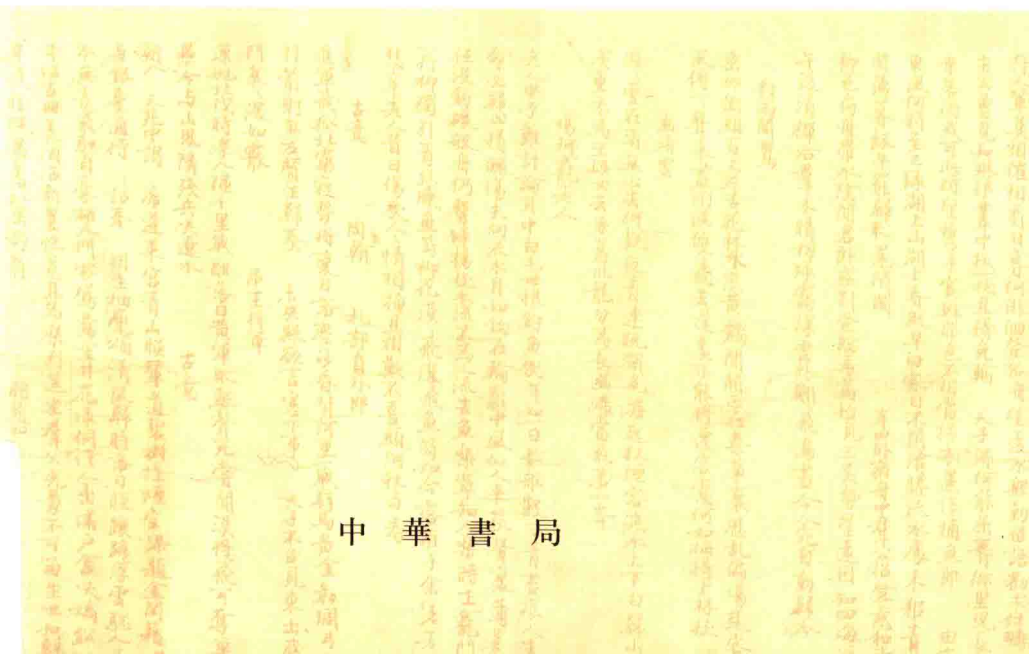


徐俊著

鳴沙習學集

上册

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



中華書局

鳴沙習學集

上
冊

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

徐
俊
著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徐俊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6.11
ISBN 978-7-101-12267-1

I. 鳴… II. 徐… III. 敦煌學-文學研究-中國-文集
IV. I206.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77357 號

書 名 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

著 者 徐 俊

責任編輯 許慶江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920×125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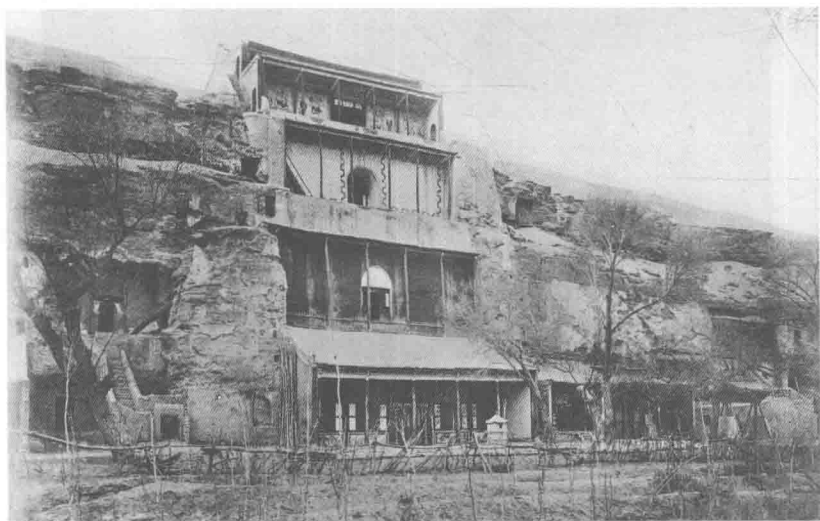
印張 21 $\frac{3}{4}$ 插頁 6 字數 540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267-1

定 價 98.00 元

本書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項目資助出版



敦煌莫高窟舊影（伯希和考察隊，1908年）



斯坦因從藏經洞（莫高窟第十七窟，圖片右部）搬出的經卷（1907年）



斯坦因從藏經洞（莫高窟第十七窟）搬出的漢文經卷（1907年）



伯希和在藏經洞（莫高窟第十七窟）揀選經卷（1908年）

序 一

榮新江

徐俊兄攜其所著《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來命我作序，論年輩，我不敢應命；論友情，我又無法推辭。徐兄與我年齡相仿，他出身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則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敦煌研究的興趣，把我們聯繫到一起，甚至成為患難兄弟。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本文獻中，文學作品也備受關注，特別是其中的俗文學作品，引起學者們的廣泛討論。作為宋明話本、小說、戲曲的源頭，敦煌變文、講經文成為關注的焦點，由此引發關於俗講及其文本的討論，使得佛經文體及講經制度的通俗化，乃至對唐朝大眾文化及通俗文學發展的影響，都有了深入的認識。對於敦煌寫本中的雅文學作品，由於開始階段學者們接觸的機會較少，只有少量詩歌和《文選》進入個別學者的視野，直到王重民先生1930年代在巴黎全面整理敦煌寫本，才得以把敦煌保存的唐代詩人與詞人的作品，比較系統地輯錄出來，以傳統的集部分類方式，編成《補全唐詩》、《敦煌曲子詞集》。以後隨著研究的進步和各國敦煌寫本的陸續公佈，學者們對於各類敦煌寫本文學作品不斷進行校錄與補充，碩果累累。徐俊兄畢業後在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工作，編書之餘，也從事敦煌文學文獻的董理，對於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中的先唐詩、前人整理過的唐人詩集、學郎詩、曲子詞、佛教

讚頌等，都有許多貢獻。我對他有關整理敦煌詩的論文至感欽佩，也知道他在這方面用力最勤，所以有問題就向他請教。記得一次周紹良先生讓我補錄敦煌卷子縮微膠卷上看不清楚的《讀史編年詩》，我請教徐兄，他出示從北京圖書館所藏王重民攜歸的敦煌寫本舊照片上所錄文字，幾乎可以補全所有膠卷看不到的文字，這讓我刮目相看。所以，當我在海外調查所得敦煌吐魯番寫本詩歌卷子時，首先就交給他來考察，由此我們倆曾經合撰過三篇文章，即《德藏吐魯番本“晉史毛伯成”詩卷校錄考證》、《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錄》、《唐蔡省風編〈瑶池新詠〉重研》，材料雖然是我發現的，但學術價值的發現和整理，基本上都是徐兄完成的。

在本書所收單篇論文之外，徐兄對敦煌學最大的貢獻，是2000年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我有幸在書出版之前仔細校讀一過，受益良多，最大的感受是他區別於前人的整理方法。這一方法在該書前言中做了很清楚的陳述，現在也以單篇論文的形式收入本書，題作《身臨其境的詩壇——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內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簡單說來，前人整理敦煌本唐詩，都是按照傳統的集部分類方法來整理的，即把散見於不同寫卷的詩歌，按照總集、別集的方式，分別歸類，特別是歸到具體人物的頭上。徐俊指出敦煌詩歌是寫本時代的產物，不能用宋以後的分類方式去整理，而應當按照寫本的性質和特徵，依寫卷的原式，一卷一卷地整理，把與詩歌寫在同一卷子上的其他內容，不論正背，統統記錄下來，這才是唐人詩卷的原貌。而這一面貌是有別於“經典文獻”的“民間寫本”，這正是唐朝社會上流行的大多數唐人詩卷的真實狀態。這一看法早在1996年我約他撰寫的《敦煌本唐集研究》書評中已經有所闡釋，其實這篇給他引來不少麻煩的書評真正是一篇敦煌學方法論的突破之作，在這樣早的時候就悟出了今天書籍史研究盛行後的寫本學理論，可見徐兄對寫本文獻見識之準，理解之深，闡釋之準確。我後來有機會參加一次美國唐代學會的聚會，他們

都在盛讚徐俊這本《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迄今出版的幾種美國中古詩歌寫卷的研究，不能不說是受到徐俊此書的影響。《身臨其境的詩壇——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內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一文其實是一篇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鴻文，但從來沒有單獨發表，這裏收入集中，希望引起年輕學子的重視。

徐兄原本打算用這一方法，繼續整理“敦煌讚頌集”和“敦煌曲子詞集”，雖然他現在投身於更重要的出版工作，但我們仍然希望這兩本著作，能夠早日完成。

有機會在本書出版之前重讀各篇大文，自有身臨其境入詩壇的感覺，也得以借助文章，回味那過去時光裏相互切磋學問的快樂。

2016年10月24日於朗潤園

序 二

陳尚君

徐俊兄輯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學論文爲一編，題曰《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囑我爲序，是不敢辭。我們結識到今年恰好三十年，也算是難得的因緣，彼此都從青澀的習學者，伴隨師友和時代共同走過來，如果說現在各自有一些感悟和所得，當然也走過一些曲折，回望走來路，感慨良多。我想借此機緣，談一些個人的感觸和領悟。

我與徐俊最初認識，更多是工作聯繫，我是作者，他是責編，有關過程，他在本書附錄《〈全唐詩補編〉編輯工作回顧》，已經有很具體的敘述。當然，同一件事情從我的立場，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拙稿《全唐詩續拾》經始於 1982 年秋，是因爲讀到中華書局新出《全唐詩外編》，感覺補遺未盡，方發願作全面網羅，到 1984 年春託友人孫猛提交部分樣稿，並將習作《〈全唐詩〉誤收詩考》投稿《文史》，得到認可並蒙約稿後，歷兩年完成初稿，得佚詩 2300 多首，於 1985 年初寄往中華書局編輯部。那時書稿積壓，處理都有一個過程，到第二年方得信，知道由徐俊擔任責任編輯。此後多次通信，他將書稿中查出的問題一一見告，並轉達編輯部退改的決定，又將《全唐詩外編》修訂的責任交託於我。1987 年夏，我到京取回書稿，方與他第一次見面。

徐俊小我數歲，南京大學中文系 1983 年本科畢業後就到中華

書局工作，拙稿大約是他最早負責的書稿之一。我於1981年底研究生畢業留校，補輯唐詩是第一項獨立確定的選題。可以說，我與他的學術起步時間先後相差不多。我的工作屬於傳統的輯佚考據，方法上較前人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是自覺地依循宋元書志和存世古籍目錄的記載，有計劃有系統地從群書中搜尋唐人佚詩的線索，因此所得比前人更為豐富。有感於唐詩傳誤的複雜性，我特別梳理《全唐詩》已用典籍目錄和前人辨偽論述，梳理《全唐詩》誤收唐前唐後詩的各種類型和致誤原因，以為自己借鑑。儘管如此，雖有收獲，仍不免蹈襲前人輯佚的各種誤失。徐俊利用編輯部所存舊稿《〈全唐詩〉首句索引》，逐次翻檢，覆核文本，指出重收，很認真地履行編輯的責任。

《全唐詩續拾》的退改和《全唐詩外編》的修訂，歷時一年，拙輯增加佚詩2000多首。到1988年9月完成，記得如此準確，是因到京交稿後去太原參加唐代文學年會，會間與徐俊等同遊五臺山，有更多的接觸和瞭解。其間我通過他向中華書局提出繼續編纂《全唐文補編》的想法，獲得支持，很快得以立項。這前後他擔任了我的四部書稿的責任編輯（另二部是與陶敏先生合作的《唐才子傳校箋（補正）》和周祖謨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後者我撰寫一半條目），前後跨度近二十年，其間他付出之多，非三言二語可以說完。

徐俊本人在學術上最重要的建樹，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00周年之際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遺書中存世詩歌的整理，當然，其間多數可以認為是唐人詩歌。收錄在本書中的多數論文，也撰寫於九十年代，可以說代表那一時期敦煌詩歌研究的前沿水平。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詩歌校錄研究，開始於1986年，不能說與我的唐詩輯錄完全沒有聯繫——那時上海完全沒有人做敦煌學，無論敦煌遺書縮微膠卷，還是臺灣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一時都無從尋覓，祇能闕如，而他工作

在北京，無論資料利用條件，還是能遇到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經常切磋交流，都是我所不具備的。他做《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體例曾與我商量，我看法比較保守，仍覺得以作者為單元處理詩歌是比較方便讀者的辦法，他則基本遵循國際上有關敦煌文本的處理規範，以各敦煌寫卷為單元，盡可能地保存和記錄各寫卷中保存的文獻信息，同時全面參考中外學者前此已經有的校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收獲，則寫成專文。

我一直覺得，1980年前後走上學術道路的一群學者，雖然都有過一段曲折和耽擱的經歷，但有幸在而立前後遇到急速變革的時代，無論環境、風氣、文獻、觀念、手段都大大超過了前代，因而可以做出超邁前修的業績。我與徐俊都恰逢這樣的機遇。以《全唐詩》的輯佚和研究為坐標，不難看出其間有關的變化。

首先是視野之開拓與更新。在我問學之初，知道唐詩研究的基本路數是以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大致從別集與選本入手，讀懂讀透文本，進而參史傳以知作者仕歷與時代，參雜史筆記以知寫作本事，參歷代詩話、評點以知前人見解，綜括上述記載結合作品作出分析，並進而對其成就作出評價。雖然以作家作品論為中心的“蘇式”研究套路在逐漸打破，但文學和歷史的界限還是壁壘森嚴。但從七十年代末開始，陳寅恪、岑仲勉等唐史學者的治學方法極大地鼓舞了唐代文學學者群體，風氣轉變可以傅璇琮等一代中年學者為代表，將法國社會學派研究藝術史的方法引入文學研究，用歷史年代學和文本闡釋學的方法，分層次地解讀作品和詩人的生命軌跡，對唐宋以來的傳說附會作了徹底的清理。其標誌一是文史打通，將所有唐代存世文獻都視為可資文學研究的依據，在廓清傳聞、還原真相的立場上梳理文人的生命軌跡，在還原文人生活的真實場景中瞭解他的文學活動與寫作動機。在此立場上說，任何一個生命個體的活動都具備研究的價值，文學寫作的任何一頁碎片都值得追究揭示，文學家作品無論存佚都值得探究明白。在這樣

的學術氛圍中，更年輕一輩的學人得以各聘所長，充分積累，努力開拓。我與徐俊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先後起步，着眼在窮盡文獻的基礎上，為學人提供可靠的詩歌文本。區別僅在於，我先行數年，依據是四部群書，他則做敦煌文獻，都曾將存世文本翻深摸透。

最近三四十年間，文學研究的視閥與觀念之變化，也都在本書中留下痕跡。比方什麼是詩歌，在詩歌的編錄中必然有與非詩作品邊界之劃定問題。清編《全唐詩》時，遵照聖意認定“道家章咒、釋家偈頌”，“本非歌詩之流”（《全唐詩·凡例》），因而一概不收，後來《唐音統籤》影印面世，可見連王梵志詩、《永嘉證道歌》之類全部刪刈，知其本意並不在辨體。而六朝文體說興起，賦、頌、讚、銘等韻文均歸文而不作詩，也早已成為共識。問題在於當窮盡文獻將所有作品搬到檯面上，特別是敦煌遺書中包含了大量介於詩與文、詩與詞之間的作品時，去取真很困難。我在1984年獲中華書局約稿後，曾去函說明擬收錄《道藏》歌詩與佛家偈頌，且劃定了界限，很快得到同意。這一決斷後來在其他方面獲得回應，如孔凡禮編《宋詩紀事續補》、北京大學編《全宋詩》，都採取了這一體例。徐俊二書也沿此體例，他本來計劃進一步作敦煌讚頌俗曲的校錄，已經獲得立項，祇是因重返書局擔任行政職務而中輟。收在本書中的《敦煌佛教讚頌寫本叙錄》，是他為此項目所作前期調查的一份記錄。我近年在重新編錄全部唐詩時，考慮較多的問題是唐詩的邊界到底在哪裏。最後的確定是從寬，雖仍然堅守傳統詩文的分際，但凡原詩存詩題、詩序、詩句者皆予存錄，詩詞俗曲皆加編存，禪僧之對句皆作收入。而錄詩的原則，則求最大可能地接近唐人之原作，且通過對五萬多首唐詩流傳文本的詳盡記錄和會校，記錄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變化。是否妥當，仍期待得到學者的賜正。但就近年一般學術風氣的變化來說，我相信接受的學者比例肯定會比以前多。

就敦煌遺書來說，三四十年代的學者祇能到巴黎、倫敦去鈔

寫，六七十年代後因為中國及英法所藏縮微膠片的流通，讓學者可以較充分瞭解各寫本的面貌，此後《敦煌寶藏》刊佈，雖不清晰，但可方便檢閱。徐俊與我都是那時開始接觸敦煌文獻，我做唐詩補遺，僅能挑部分相對清楚，且有作者歸屬者錄出，徐俊在此條件下開始敦煌唐詩的校錄，且陸續發表了幾篇有份量的論文。九十年代初《全唐五代詩》啟動之際，就將相關詩歌文本的整理委託于他，又應他的要求，利用項目經費從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據縮微膠卷放大影印了有關詩歌的部分，給了我一份副本，至今仍在。雖較前清楚，但模糊者仍多，細節判讀仍需費力推敲。記得《珠英集》中胡皓的一首詩題，王重民初讀為《奉使□府》，後人據原卷或補“林”字，或補“杜”字，都有疑問，徐俊曾與我反覆討論，看文本字形，更傾向是“松府”，並查到貞觀年間松州曾置都督府，聯繫詩中“蜀山周（項楚校作匝）地險”，得以確認。此字若得楷定，自不難辨識，但本為不規範的寫本，復經攝影複印後的變形，偏失難免。到九十年代，四川、上海高清影印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閱讀和辨識更加方便。近年聽聞有更清晰的網絡本發佈，實在是學者的福音。

此外，最近三四十年由于國家開放，各方努力，從《四庫全書》之普及，到《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以至《中華再造善本》之刊行，大量以往深藏不為學者所知的典籍及其善本廣泛流通。以二十四史整理為標誌的古籍整理規範的確定，大量基本古籍有新的會校善本出現，加上門戶開放帶來中外交往之頻繁，世界範圍內漢籍及其善本的存藏情況為更多學者瞭解。可以說，當代學者能夠見到的宋前古籍數量之豐備，善本之精良，都大大超過了明清兩代一般學者之所知。就唐詩校訂來說，無論為訪書奔波一生的明人胡震亨，還是因繼承鹽商家業而富擁書城的清人季振宜，他們的努力值得稱道，他們當年掌握之文獻，除極少數為今人所不得見，就整體判斷，比今人廣泛佔有全球圖書館之藏書來說，實在是

很寒儉的。在胡、季二家基礎上倉促拼成的《全唐詩》，可以爲今人超越，當然毫無疑問。“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較早對此有所認識，因而可以取得一些進益。

至于手段之更新，最重要的當然是電腦寫作的普及、古籍數字檢索的實現和互聯網的應用。筆記本電腦寫作始於九十年代初，我入手很晚，而且覺得在古籍整理方面應用價值不高，因爲底本從古籍善本到電子文本，其中要有一次輸入校對，更重要的則在古籍文本校勘過程及其前後痕跡，沒有保留，也不便追溯。2006年開始一部大書的修訂時，仍堅持在紙質文本上操作。但從2008年我決意自己重編新本《全唐詩》，並全部採取電子文本寫作時，感受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是數以千計的作者，數以萬計的文獻，可以放在一個文件夾裏，隨時調取或修改，取用極其方便。二是文本可以成百上千次的修改，不像我以前做全唐詩文補遺，一首詩或一塊大碑的修改，僅改三五次，即鉛黃滿紙，天頭地腳都佔滿後，祇好傍粘另紙，更膽怯於如何讓編輯接受，讓排字工人識讀。三是文本對校極其方便。比方《千載佳句》存五百多則白居易詩的零句，因源出唐時古本而極可珍視，但國內前此各整理本均無通校的記錄，可以想見，從三千首詩中要找出五百多個散句之異同，需要多大的投入！現在則輕快得多了，一、二天即可完成。

古籍數字檢索，對傳統學術的衝擊，在最初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有些學者甚至宣佈如古籍輯佚、校勘、訓詁等學問，今後幾乎可以不再做了。我最初也有這樣的困惑。如《全唐詩》互見誤收之鑒別，最初有人做首句索引，仍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於是再做每句索引，比前精密，但異文仍會影響檢索的準確，因而部分別集出現了每字索引。但與唐前宋後詩的互見怎麼辦？傳統索引技術仍無法解決。數字化技術的展開，先有人做《全唐詩》索引，繼而四庫全文檢索推出，再有《中國基本古籍庫》之完成，各種數據庫蓬勃出現，爲古籍文本研究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在應用多年後，我的感受是，